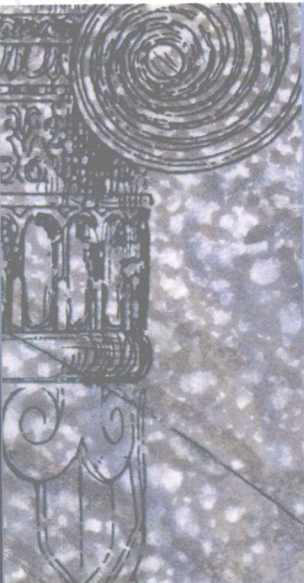


第3辑

周启超 主编



跨文化的 文学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外国文学理论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A类)中期成果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3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第3辑/周启超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301-17177-6

I. 跨… II. 周… III. 比较文学-文学理论-文集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798 号

书 名: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第3辑

著作责任者: 周启超 主编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77-6/I·22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5 印张 325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卷首语	周启超 /1
“复调”、“对话”、“狂欢化”之后与之外	
——当代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新进展	周启超 /4
列维-斯特劳斯的全人类视野及	
对话和颠覆思想	史忠义 /20
跨文化:俄国现实主义文论的	
旅行与重建	吴晓都 /27
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日本与中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土化的比较研究	庄 焰 /53
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理论遗产	徐德林 /65
圣伯夫:在现代性的门槛上	郭宏安 /95
从对话原则引出的双重推论	
(Une double réduction à partir du principe	
dialogique et à propos de ce principe)	史忠义 /125
故事结构的逻辑语义	董小英 /130
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纠缠”	
——兼谈《启蒙辩证法》的“总体性”	盛 宁 /155
胡适版的“欧洲各国国语史”:	
作为旁证的伪证	程 巍 /178
以文学为业	
——罗伯特·穆齐尔的“诗人图”	徐 畅 /200
“你是神,还是凡人?”	
——荷马史诗里人物辨识神人现象的	
文本解读(三)	陈中梅 /214
文学作品/文本理论研究的基本旨趣	乔 雨 /231
在对话中生成的文本	
——巴赫金“文本理论”略说	周启超 /244

从作品到文本

——谈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维度	车瑾山 /258
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演化的历史脉络	刘象愚 /264
外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总结报告 (2004—2008)	乔 雨 /294
2009 年度外国文学理论学科发展报告	徐德林 /311

卷首语

周启超

这些年来,随着文论界学者向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或文化学的大举拓展,文学理论在日益扩张中大有走向无边无涯而无所不包之势。相对于以意识形态批评为己任而“替天行道”的“大文论”的风行,以作家、作品、读者为基本对象的“文学本位”研究似乎走到了尽头。于是,“理论终结”或“文论死亡”之“新说”应运而生。甚至于有急先锋向“文学理论”这一学科本身发难:质疑它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怀疑它的身份。于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文论研究的空间”成为文论界同行十分关心并热烈争鸣的一个话题。文学理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文论研究是否真的已然终结?

在对这个问题加以讨论之际,我们仍然有必要冷静地放眼世界。这并不是要迎合“全球化”大潮,与洋人“接轨”——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上的“一体化”;这也不是为了什么“走向世界”——我们本来就在这世界上。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的文学的发育运行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在差异中还有没有相通之处?

事实上,今天的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

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

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现代国外文论,就应当看到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其互动性与共通性。所谓国外文论,就不仅仅是“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也不等于“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而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之分别。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极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的借鉴,多元素的吸纳,才有可

能避免偏食与偏执。这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深化,尤为需要。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及“外国文艺理论学科”同仁就积极面对当代国外文论发育的多声部性与多形态性,积极面对当下国内文论发育的生态失衡——我们在国外文论的研究上往往驻足于思潮的“跟踪”、时尚的“接轨”,在国外文论的借鉴上时不时地就失之于“偏食”甚至“偏执”——这一理论生态失衡的现状,而以其对国外文学理论展开多语种检阅与跨文化研究的视界,以其多方位参照、深度开采、吸纳精华的宗旨,启动“比较诗学研究”及“跨文化的文学理论”这两个项目。前者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由周启超主持,由刘象愚、史忠义、周启超、金惠敏承担;后者由周启超、郭宏安主持,由郭宏安、史忠义、董小英、周启超、吴晓都、程巍、任昕承担。

我们的基本理念是:现代文学理论是在“跨文化”的状态中发育起来的,而具有“跨文化”的品格;今日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自觉地具有“跨文化”的视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也是一种必要;文学理论研究要突破单一国别甚或单一区域的局限。在不同国别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学理论比较,将有助于“理论诗学”的建构。

“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落点还是文学理论。

比较以跨文化视界来进行,还是要落实到文学理论本身。

观照视野的开阔,是为了文论研究的深化。要恪守“文学/文论本位”。不能将这种比较泛化成“跨文学/跨文论的文化研究”。诚然,今日的文学/文论其内涵、其界面已大大拓展,非昔日所能比,但核心命题并未消失。作家、作品、读者仍然是从“文学性”到“文学场”的种种文论研究难以回避的基本话题。比较要考虑“可比性”。分子水平上的“比较”,也许可以保障这种“可比性”。驻足于各种思潮的更迭、各种主义的较量,很难进入深层的、有可能以互证互识而达致“会通”的比较,很难进入彼此,并无影响可言,也谈不上什么平行,但却有精神理念上契合会通的“类型学”比较。对于一个比较学者而言,最具有诱惑力最具有价值的,也许正是这种比较,这种有可能去发现“隐于针锋栗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诗学“通律”的比较。自然,这是最具有诱惑力的,也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比较并不是理由。比较诗学本身也并不是研究目标。为比较而

比较没有多大学术价值。比较诗学应当是一种路径。通过它,可以走向理论诗学的深化;理论诗学建设可以也必须在比较诗学中进行。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与互动机制,决定了理论诗学的建构可以也必须在不同的诗学思想体系的对话与会通之中展开。

所谓理论诗学,就是以比较开阔的文化视界,就文学发育本身的基本环节上的理论展开理论性反思,以文学作品的结构肌理神韵、作家与读者的主体能量、审美姿态、创造机制、接受方式、文学性与文学场的生成机理与互动形态这样一些诗学的核心命题上的理论积累,作为批判性审视的对象,对各种范式的文论所关注的基本课题加以清理,在理论抽象的层面上,来寻求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共通的“诗心”与“文心”。

这样的研究,是面对“大文论”的冲击而守护文学本位,而坚持文学本体研究;又是针对“小文论”的封闭而开拓理论空间,开放理论视野,探索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之局限的文学理论,探索超越单个文化体系之上而具有一种世界性普遍解释力的文学理论。

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这样的构想也许不过又是一种“乌托邦”。但我们以为,文学学园地的耕耘,还是需要“乌托邦”情怀,需要一批有所开放而又有所恪守,有所解构而又有所建构的“乌托邦主义者”。

“复调”、“对话”、“狂欢化”之后与之外

——当代中国学界巴赫金研究的新进展*

周启超

【内容提要】 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几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引进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化学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已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在引进“复调”、“对话”、“狂欢化”学说之后与之外,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潜心于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开采,多方位地展开巴赫金学说的语境考量,多层面地思索巴赫金思想与学说对于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科之方法论上的启示,努力将当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巴赫金研究不断推向纵深。

【关键词】 巴赫金文论 话语理论 语境考量 方法论启示

苏联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的学术思想在新中国的登陆与旅行,或者说,中国学界对巴赫金这位外国学者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已然经历了30个春秋。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30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引进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哲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文化学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语言学家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已取

* 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俄罗斯文学”国际研讨会(莫斯科,2009年12月18日—12月22日)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米·巴赫金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旅行”的一部分。

得十分丰硕的成果。

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叙事学与小说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文学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狂欢化理论”的应用深化了当代中国学界对经典作品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当代中国学者对文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与文化效应的探究;“巴赫金理论的语境研究(比较研究、影响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卷入当代文论乃至整个人文学多种思潮流脉、学派学说交织互动共生的磁力场。巴赫金的思想与学说,极大地开拓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思维空间,积极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想解放与变革创新。^①

巴赫金的思想与学说既能与当代国外各种文论思潮学派理论资源相对接,又能与当代中国文论建设的现实需求相应合,而生成极富弹性的参与性与极富有潜能的生产力。这不仅体现为当代中国学者对复调理论、对话理论与狂欢化理论已有相当深度的解读与相当广泛的运用,也体现于中国学界对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开采上,对巴赫金学说的语境考量上,对巴赫金思想学说之于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建设的方法论启示的思索上。这些层面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一、话语理论的阐发与运用

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语言哲学思想,“超语言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超语言学”是巴赫金自己的命名方式,它面对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超语

^① “巴赫金文论在中国”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已成为“接受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有文章,譬如,周启超:《开采·吸纳·创造——谈钱中文先生的巴赫金研究》,载于《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汪介之:《巴赫金诗学理论在中国的流布》(2004年湘潭“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也有博士学位论文,譬如,曾军:《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素玫:《与巴赫金对话:巴赫金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华东师范大学2006级博士学位论文),甚至已被写进《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第二卷),陈建华主编,重庆出版社,2007年。这些从各自视角评述“巴赫金在中国”的文章,为本文的梳理提供了基本材料,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点的独立学科”^①。巴赫金专家们将巴赫金的超语言学思想分成“言谈理论”(“表述理论”)、“言语体裁理论”、“话语理论”、“修辞理论”、“意义理论”等等。其中,“话语理论”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受到最多关注。

“话语理论”的接受语境比较复杂。较早关注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学者,将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纳入后现代话语理论知识谱系中,看出巴赫金重视对语言的社会历史性语义分析,批判了索绪尔“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提出了专门研究“活语言”的“超语言学”,颠覆了“语言/言语”的二元对立;看出巴赫金坚持其一贯的对话原则,向索绪尔的“言语”里注入了“社会性、历史性、对话性与具体语境”,将它改造成独创性的“言谈”,还借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针对索绪尔的“系统决定论”,提出了“意识形态符号论”,强调语言作为特殊的符号系统,“在实际运用中渗透了意识形态充盈物(ideological impletion)”。正是这些杰出的贡献,使巴赫金站在了当今话语理论的门槛上。巴赫金“未曾也不可能对话语这一宽泛复杂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围绕话语问题,巴赫金先后使用过三个相关性概念:言语、言谈和话语^②。

正是由于“言谈”与“话语”紧密相关,起初,我国学者们更关注“言谈”理论——从不同角度切入巴赫金的“言谈”理论,或从文化理论,或从文本理论。

有学者将“言谈理论”与巴赫金的文化人类学思想关联,认为“巴赫金的文化人类学思想,主要是围绕着语言的结构性、组织性的规律展开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以“言谈”为中心的语言模式和文化模式。^③有学者则是从巴赫金的“文本观”而关注起“言谈”,认为“巴赫金把文本界定为‘言谈’,对‘言谈’的解释与框定可以说是巴赫金文本观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对文本研究的独特贡献”^④;“言谈”因其对说者、

① 《巴赫金全集·诗学与访谈》,钱中文主编,白春仁、顾亚玲等译,第239—24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赵一凡:《话语理论的诞生》,《读书》1993年8月;《阿尔都塞与话语理论》,《读书》1994年2月;《福柯的话语理论》,《读书》1994年5月。

③ 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第1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④ 晓河:《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的叙述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2期。

听者、话题、主题、意义的重视,因其作为“言语体裁”中心环节,使得“文本”在巴赫金那里获得极为丰富的内涵。

巴赫金的文本理论已受到当代中国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正是通过确认“文本”是语言学、语文学、文学学诸人文学科的第一性实体,是人文思维的直接现实,巴赫金在有力地捍卫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正是通过确认“话语文本”是一种有声的超语言的表述,是主体间的交锋互动的事件,巴赫金在有效地坚守人文科学的“人文性”。正是通过确认“文学文本”具有“双声语”品质,巴赫金精辟地阐明了文学创作的“对话性”,文学接受的“开放性”。巴赫金这样一些重要的文本思想,是与他同时代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展开的一种潜对话。巴赫金的文本理论,是其独具特色的“话语诗学”建构中的重要链环,是20世纪理论诗学的精彩篇章。^①

与“话语理论”相关而直接考察巴赫金的“言谈理论”之超语言学价值的,始自1996年。这一年,有学者正面阐述巴赫金“言谈理论”的性质、形式、内容、应用范围以及制约它的条件,正面肯定巴赫金的“言谈理论”是“前人从未涉及的开拓性成就”^②;有学者对巴赫金的“言谈理论”予以精细的分析,认为“语言学中的基本单位是词和句子,而超语言学中言语交际的基本单位则是言谈(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并对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特征进行了辨析^③;有学者将“言谈理论”与语用学相比较,不同意将“言谈”视为语言学中的一个单位,相反,它是一个言语交际的领域。语言学的终点正好是超语言学的起点。巴赫金的“言谈理论”是一种关于活的语言的理论,它充满了社会一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言谈”作为具体的、社会的交际中的话语,“具有社会性、对话性、指向性、不可重复性、不可再生产性、独特性、互文性以及它总带有的价值判断性”^④。

直接探讨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文章之面世,则要到1999年。这一年,白春仁教授指导的一篇以巴赫金“话语理论”为论题的博士学位

① 周启超:《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 晓河:《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及其在语言学、诗学中的地位》,《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③ 王加兴:《巴赫金言谈理论阐释》,《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④ 宁一中:《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

论文《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话语理论与哲学思想关系研究》^①通过答辩。论文针对“对话”与“话语”——巴赫金理论体系中两个最重要的范畴,但话语及其对话性这一复杂问题少有整体的翔实的研究,力图结合巴赫金的对话哲学,探讨其话语理论中“话语对话性”这一思想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作者关注巴赫金对语言的思考,始终围绕着语言的使用者——说者与听者(作者与读者)——而展开,认为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能够提出目前仍具有前沿意义的新课题。论文将巴赫金的语言学思想概括为“语言的生命在话语,话语的生命在价值,价值产生于对话,对话贯穿于文化”,认为话语的对话本质可以沿这条线索“立体”地揭示出来,而揭示话语的普遍对话性,可望为理解巴赫金的整个对话主义思想,带来见一斑知全貌的效果,为理解语言艺术乃至人文话语,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这篇论文没有出版,但它的一部分内容或与之相关的文章相继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了^②;凌建侯将“话语”(слово)作为巴赫金思想的核心概念,认为对话理论是巴赫金人文思想的核心,而话语(слово)的内在对话性,最终揭示出个人行为的实现方式,进而则是整个道德的存在形态——平等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在论述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时,实际上还是在论述其“言谈理论/表述理论”^③。这里面很有文章。有学者认为这两个词的所指是同一个,只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侧重点不同:用“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英译“utterance”)在于强调“话语”的语言学属性,而“(слово)”(英译“discourse”,有时是“word”)则包含它们所有的内涵。也有学者认为“discourse”与巴赫金的(высказывание)相比,有其相同的地方,但不是对应词。由于“discourse”译成“话语”已是“俗成”,再把巴赫金的(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译成“话语”,似觉不妥^④。

之所以发生这些不同的理解,是由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本身需

① 凌建侯:《话语的对话本质——巴赫金话语理论与哲学思想关系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② 凌建侯:《试析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及其核心概念“话语”(слово)》,《中国俄语教学》1999年第1期;《话语的对话性——巴赫金研究概说》,《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3期;《巴赫金话语理论中的语言学思想》,《中国俄语教学》2001年第3期;《巴赫金言语体裁理论评介》,《中国俄语教学》2000年第3期;《言语体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张会森:《作为语言学家的巴赫金》,《外语学刊》1999年第1期。

④ 晓河:《巴赫金哲学思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6页。

要跨学科的理解。话语自身的特性、它的功能和地位,是巴赫金话语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没有扎扎实实的细致入微的话语分析,没有对于话语功能的独特发现,对话理论的建立也就无从谈起。深入理解巴赫金的理论学说,研究其话语观是一项基础工作。巴赫金辨析的“话语”处于众多学科的边缘上,不独属哪一门却贯通语言学、文学等人文科学及文化等多个领域。纵观他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以话语始以话语终^①。紧紧扣住“话语”这一核心,进入巴赫金在文学学与语言学、诗学与美学、伦理学与哲学诸多学科的理论建树之内在机理的探究,是巴赫金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大标志。与“话语理论”相纠结的巴赫金语言学理论中的一系列学说的价值,已经受到我国学者所关注。有学者看到巴赫金的“言语体裁理论”对当代修辞学发展的意义^②;有学者关注巴赫金的语用学思想对语言的社会学研究的启示^③;有学者看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的“表述”扩大了“语境”的范围,提升了“语境”的功能^④;有学者认为正是巴赫金的“双声语”概念使“超语言学”被引入诗学,成为巴赫金建构复调诗学理论的学理基础^⑤。有学者在探寻以“言谈”为核心的语言哲学和以“对话”为核心的文化理论的关联,指出语言哲学是其文化理论的基础^⑥。有学者认为“超语言学”的内在哲学精神——参与性、对话性和存在性使“超语言学”逼近语言与人的生存状态^⑦;有学者分析巴赫金如何将“对话”这一语言学概念转换成哲学概念,成为其语言哲学的核心和灵魂^⑧。巴赫金的语言哲

① 《融通之旅——白春仁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② 张会森:《作为语言学家的巴赫金》,《外语学刊》1999年第1期。

③ 辛斌:《巴赫金论语用:言语、对话、语境》,《外语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郑欢、罗亦军:《充满张力的活力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语境试析》,《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⑤ 丰林:《超语言学:走向诗学研究的最深处》,《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⑥ 吕宏波:《从“言谈”到“对话”——巴赫金语言哲学与文化理论》,《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⑦ 郑欢:《从“应分”到“对话”——超语言学的内在哲学精神》,《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⑧ 萧净宇:《巴赫金语言哲学中的对话主义》,《现代哲学》2001年第4期;

萧净宇、李尚德:《从哲学角度论“话语”——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学思想,是我国巴赫金研究中最新热点。不仅有一系列述评概观性文章^①,而且已经有以巴赫金语言哲学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②;沈华柱的专著由五章组成:“超语言学”的语言哲学(有专节论述“表述”、“言语体裁”、言语的“内在对话性”);语言的“对话性”及其文本分析(有专节论述“双声与微型对话”、“大型对话与复调”);巴赫金的文艺学方法论;巴赫金语言思想及文艺学方法论的价值与地位。萧净宇的专著,则偏重于将巴赫金语言哲学置于俄罗斯语言哲学进程中来加以考量,细致梳理“巴赫金语言哲学渊源”、“超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的实质(有专节论述“超语言学”话语理论、“超语言学”话语理论的哲学启示)、“对话主义”——巴赫金语言哲学的核心(分节论述“对话”的哲学传统、对于“对话”思维的考察、“对话主义”的哲学阐释、“对话主义”的当代意义、“对话”思想的比较)、巴赫金诠释学及其人文科学认识方法论、巴赫金语言哲学对俄国语言哲学界的意义。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哲学价值,在这里已经作为巴赫金语言哲学一个重要内容而受到专门的关注与探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问题,被置于“表述”的应答性、话语的对话性、文本的两极性上来加以考量。

当代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的兴趣还在升温。有文章注意到巴赫金“话语理论”是一种超越性的建构:巴赫金以“超语言学”命名的话语理论,是在对以洪堡为代表的个人主观主义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抽象客观主义的语言哲学,展开双重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建构的。在规避个人主义忽视社会性、抽象客观主义仅仅关注体系性的局限之后,巴赫金主张以现实生活中以交际为目的的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转换,导致了语言哲学最为关注的意义观的转型。巴赫金的话语理论的建构,重建了语言与主体、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实现了主体性与历史性这种“被压抑者”的回归^③;也有文章开始考察话语的对话性机制与诗学的关联,意识到“对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表述”会与他人话语产生对话;二是“表述”以听者的存在为前

① 杨喜昌:《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初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沈华柱:《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述评》,《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刘涵之:《巴赫金超语言学思想刍议》,《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沈华柱:《对话的妙悟: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萧净宇:《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刘晗:《双重批判与反思中的理论建构——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一》,《新疆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期。

提,以获得应答与对话为目的;诗学等人文学科的本质就在于它们以话语作为存在方式,且具有一种内在的对话性^①。

二、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考量

巴赫金的理论学说是在十分丰富而复杂的语境中产生的,是在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与符号学,与阐释学,与历史诗学,与存在主义,与精神分析文论等多种思潮流派的对话与潜对话中产生的。巴赫金研究的深化,必然推动学者们进入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梳理。这一语境梳理,经常是以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的方式来展开的。诸如巴赫金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与克里斯蒂瓦,与巴特,与雅各布森,与洛特曼;或者,巴赫金与钟敬文,与朱光潜,与冯梦龙,都已经是中国学者探讨的话题。

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有几种观点。其一是认为巴赫金对现实的思考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相同之处,因而巴赫金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有文章指出,巴赫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他探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所不予注意的问题;但从他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他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评论来看,他确实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探讨语言理论、文艺理论问题、精神分析问题,而且实际上比那时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的人要深刻得多、准确得多^②;有文章认为,巴赫金理论根植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③。其二是认为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他既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俄罗斯形式主义,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战略作了适当的调整和发展,例如他重新审视了内容决定形式的模式并给予形式以新的重要地位;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语言学阐释,强调“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巴赫金经历了由一位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而最终仍只是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

① 刘晗:《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巴赫金话语理论研究之二》,《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8期。

② 钱中文:《巴赫金:交往、对话的哲学》,《哲学研究》1998年第1期。

③ 刘康:《一种转型期的文化理论——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当代文论中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倾向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历程。他正是在吸纳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过程中开辟自己的理论新天地^①。其三是认为巴赫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学者看到,把巴赫金看作马克思主义者的理由主要表现在涉及语言问题的著作中。《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标题,可以有两种理解:就积极的、主动的一面看,巴赫金认识到了对马克思思想可作生存论的理解;就消极的、被动的一面说,在当时苏俄的意识形态下,他需要借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来发挥自己的独特看法。只取“语言哲学”一个角度探讨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得出结论:巴赫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并不在于“巴赫金不是有争议文本的作者”;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而不显得生硬,是因为马克思经典作者与巴赫金对现实存在的思考有某些相通之处。超越抽象理论世界和追求生动世界的哲学目标使两者接近了。^②

巴赫金与形式主义。巴赫金是俄苏形式论学派的同时代人,他与“形式主义”学派是什么关系?有学者将巴赫金纳入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将巴赫金文论作为形式主义文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分析^③;更多的学者思考巴赫金对形式主义学派的批判与超越:或关注巴赫金以自己的语言学思想对形式主义的批判^④;或清理俄苏形式论学派与巴赫金思想的契合点和差异性,对比“陌生化”与“狂欢化”这两个核心概念^⑤;或以“文学性”为基点,考察巴赫金对形式论学派的超越路径,指出巴赫金在与俄罗斯形式主义的“批评对话”中,既克服了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又富于创建地拓展了形式主义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文学性”问题^⑥;或梳理巴赫金文论的逻辑起点,看出巴赫金是从校正“形式论学派”非美学化非哲学化的偏颇起步,看到巴赫金也是积极地吸收了“形式论学派”的合理成果,追求由科学化“解析”与入文化“解译”所整

① 萧净宇:《超越语言学——巴赫金语言者哲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1、29页。

② 凌建侯:《巴赫金哲学思想与文本分析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5、79页。

③ 赵志军:《艺术对形式的构造——作为形式主义的巴赫金》,《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王建刚:《艺术语/实用语:虚拟的二元对立——巴赫金对俄苏形式主义诗语理论的批判》,《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⑤ 张冰:《对话:奥波亚兹与巴赫金学派》,《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⑥ 董晓:《超越形式主义“文学性”:试析巴赫金对俄国形式主义的批判》,《国外文学》2000年第2期。